

成绩倒数怎样考上北大

几乎所有认识孙宇晨的人都觉得,他考入北大是个奇迹。

大一时,他在《萌芽》杂志写下《一道论证题》,试图向人们证明“高中可以用一年的时间弥补任何的遗憾,只要你下定了决心”。他在文末留下自己的通信地址,邀请中学生和他一道证明这道题目。文章发表后两年多里,他收到了接近1万封信件。

而如今,他即将以北大历史系总分排名第一的成绩结束4年的本科学业。

沉迷于文学世界不可自拔 成绩在全班稳居倒数前十

整个中学阶段,孙宇晨从来都不是老师和同学们眼中的“好学生”。初中时他就读于一所寄宿制学校,他对3年初中生活的记忆,大多与网游有关。中考前他突然“觉醒”,用功了半年,跌跌撞撞地考入了惠州一中。

进入高中后,他对网游的热情骤减,因为他发现了新的兴趣点——小说。受在大学中文系任教的父亲影响,他接触了王小波的作品,并因此开始疯狂阅读各类小说。除了班主任的英语课不方便逃课外,其他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图书馆看小说。全班48个人,他的成绩“稳居倒数前十”,老师们对他的期望是“保惠大(惠州大学)、冲汕大(汕头大学)”。

那时的孙宇晨认为,应试教育和文学理想是对立的,在他看来,接受“全面平庸”的应试教育近乎“奇耻大辱”。他因此并不在乎考试成绩,即使全科挂红灯也无所谓。

必须纵身跳入应试教育的河水中 尽管也许会将被棱角冲刷干净

带着二三分的数学、物理成绩,孙宇晨在高二时不得不选择转为

文科生。此时的他发现自己已不再像高一那样不带任何功利性地为了看书而看书”,而已经开始渴望得到别人的承认。

带着极高的期望,他先后报名参加了第八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和北京大学的自主招生考试,结果却黯然落选。这对他产生了极大的打击,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必须纵身跳入应试教育的河水中,尽管它也许会将我这快石头的棱角冲刷干净”。

他为自己定下五项要求:第一是把所有与应试无关的书全部搬回家,只留下一本胡适的晚年谈话录;第二是绝对不进图书馆,所有课程一堂都不能缺;第三是收起对老师的爱憎,以获得应试的知识为目的;第四是保证晚自习的时间,3小时积极进行应试训练;第五是制订每天的计划,并严格执行。

带着450分左右的模拟考试成绩和上述五项对自己的要求,孙宇晨进入了高三。他给自己偷偷定下冲刺目标:中山大学,“极限的非分之想”,则是中国人民大学,王小波的母校。

一年时间成功完成 从三本到北大的冲刺

孙宇晨执行五项要求的初始阶段,成效并不明显。但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选择,在他看来,到了高三的冲刺期,方法已经是次要的,最关键的是态度和坚持。

渐渐地,他的成绩逼近了600分,但增长势头也就此放缓。他意识到,自己陷入了瓶颈期。在广东省,600分左右的高考成绩将意味着他很有可能无法考上重点大学。

而就在此时,他获得了第九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复试资格,当时距离

高考还有6个月。

老师和父母都劝他不要去上海参加复试,但孙宇晨觉得自己“理想主义开始重新萌动”,抛下所有顾虑,前往上海参加复试。

事实证明,他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他顺利拿到一等奖,随后的高校见面会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程郁缀和招生办公室主任刘明利看中了他身上的理想主义,给予了他参加北大自主招生的资格,可在高考时于录取分数线下20分录取。而这意味着,若想考入北大,他还需要在剩下的5个月内将成绩再提高50分。

此后令他感到神奇的是,他此前最头疼的英语,从参加完“新概念”后的第一次考试起就彻底冲破了瓶颈——此前他的英语成绩从未上过100分,而自那次考试起,就从未下过110分。而其他科目的成绩,也都在稳步提升。

他后来如此解释这种“完完全全的飞跃”:每个人的潜能其实往往是被过低的自我预期所压抑,而过低的自我预期则源于外在制度压迫。

在他前进的脚步中,高考如期而至。他最终考出语文115分、数学132分、英语130分、综合146分、历史127分、总分650分的出色成绩,成功完成了从三本向北大的冲刺。

在北大相对更加宽松自由的学习环境中,他如鱼得水。他先习中文,后学历史,成绩稳居历史系第一。他担任北大西学社社长,代表北大赴荷兰海牙参加世界模拟联合国大会,还曾获颁演讲十佳称号。

在那篇引来近万封回信的《一道论证题》的结尾,他如此写道:“我相信自己的才华从来没有被应试教育的河水冲刷殆尽,而是我真正成功地挑战了应试教育。最后,我仅仅有两点希望:一是希望有理想的人不要向现实低头;二是希望大家一起帮我做这道题目,我希望它在你们每个人身上都成立。”

摘自《中国青年报》

别人关注手时你关注脚

李国威

现在人们谈成功多言秘诀,其实成功的基础是你要花更多枯燥的时间将某种能力或技艺进行堆积。有统计说,像钢琴这样的职业要一万小时的训练、十年以上的磨炼才能成为钢琴家,还要加上素质、机遇,等等。

如果你的积累差不多了,也许可以考虑一些秘诀。我发现不同行业的大师,最后成功的推力都是反正常

思维的,或者说是深入到某种能力的深层,触及到了真谛。网球大师费德勒,在高手如林的世界网坛称霸多年,靠的是比人快半拍的反应,他与对手出球的时间几乎同步,而不是在对方球打出来才开始移动。

钢琴大师霍洛维兹,拥有出神入化的钢琴演奏技巧,他却说成就不在手上,而在于经常为人忽视的足底。

他仅有的一部著作,就是关于钢琴踏板的使用。

高尔夫大师“金熊”尼克劳斯,在别人都拼命研究腰部、手臂的节奏时,他的观点却是“高尔夫是两脚之间的运动”,将击球的秘密指向脚下。

所以,让我们不辞辛苦地向前走,去寻找与常人拧着的想法,比如人家都关心手的时候你应该关注脚。

当然,真正的见地来自于内心,或者内心与外部思想的灵感碰撞。需要注意的是,大师们的建议来自他们自身的基础和体验,是达到一定境界之后的捷径。

摘自《青年文摘》

美国大学生为啥不愿当“公务员”

凯普

服务于政府的工作人员的称谓,在不同的国家差别很大。我们以前叫“干部”,后来称之为“公务员”。在我看来,“公务员”这个称呼比“干部”亲民多了。同样是服务于政府的工作人员,在美国叫“政府雇员”,称谓与企业雇员一样。不能不说,英语的词汇还是贫乏,体现不出对政府工作人员足够的尊重。难怪有调查说,美国的很多大学生不愿应聘做政府雇员呢。

美国大学生不愿应聘做政府雇员,当然不仅是称谓上的“面子”问题,主要还是“里子”有些薄:美国法律规定,政府雇员的工资以企业雇员为参照,政府雇员的工资跟着老

百姓的工资上涨,老百姓的工资涨了以后政府雇员才能涨,且工资涨幅必须低于老百姓的工资涨幅。这就造成了很多政府雇员的薪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美国政府雇员受到的种种“不公”,主要是美国《联邦雇员可比性工资法案》造成的。该法案规定:在同一地区,一定要不打折扣地体现同工同酬;在同一地区,工资等级差别取决于岗位性质和工作表现;联邦政府雇员必须与同一地区私营企业同等工作性质的职工工资标准一致;必须彻底消除联邦政府任何雇员与私营企业职工工资不平等的现象。

美国人用了什么办法,让政府雇员不能要求提高工资呢?美国的

法律说了,政府雇员的工资由议会根据法律确定,然后去市场上招聘,你要是应聘政府雇员,就代表你同意这个工资标准。你做了政府雇员以后,可以提议涨工资,但这要有两个前提:第一,你所服务的地区,其他人的工资都提高了,你当然可以要求水涨船高;第二,即使你是议员,你们通过了给政府雇员涨工资的议案,也要等下一届才能兑现——自己不能给自己涨工资!下一届你能不能当选还不一定呢。

这样的规定,逼着政府雇员们做好服务,只有老百姓的工资提高了,政府雇员的工资才能提高。

摘自《青年参考》

挪威富裕之谜

刘旭东

位于奥斯陆峡湾边,用白色大理石和闪烁的玻璃幕墙组成的建筑物是该市新建的令人赞叹不已的歌剧院,时常高朋满座。

几年前,这里还分布着造船厂、木材加工厂。如今,这里是造价高达6.7亿美元的地标性建筑物的演出大厅。

其实,歌剧院只是正在奥斯陆和挪威其他地方兴建的一个多耗资不菲的建筑项目中的一个。这些项目包括中央火车站、国际学校、图书馆……

挪威的确是一个谜。这个在30年前还被列为“相对贫困”的国家,怎么就成了世界上生活水准最高的国家之一了?

“挪威人的成功全凭石油吗?”经济学家喃喃自语。这个国家只有480万人口,却是世界上第六大石油出口国,排在科威特和伊朗之后。

“挪威的状况得益于好运和优秀的管理。”国家石油公司的开拓者阿尔沃·约翰森解释道。

1969年9月的一天夜晚,在位于北海岸外300公里的油田钻井平台上,一位经理向上司报告:“你醒了吗?我在北海上发现了石油,到处都是!”

挪威人从其他民族的教训中,学会了怎样不去滥用意外之财。荷兰人将他们的天然气收入用于社会福利计划,没有考虑多储备一些,结果引起通货膨胀;丹麦人将他们未

来在沿海寻找石油的勘探权,转让给当地的一家私人公司。而挪威人认为,如果在北海能发现大量的石油,那将是“大家庭的未来”,所有的挪威人都应当受益。

最初,挪威议会就决定不将石油收入列入国家财政计划之中,而是放入一个主权财富基金中进行股票和债券投资,以衍生出更多的收入,该基金只有通过授权才可动用。随着油价愈演愈烈,能源价格飙升,该基金的收益大幅提高。到2009年年底,它已价值4150亿美元,每个季度的收益达到520亿美元。

挪威政府将这些钱用在了教育、医疗卫生和儿童抚养的免费服务上。

“在任何时候,你所获取的轻易之财都要小心地使用,要想到与未来的一代分享这笔财富。”约翰森说。

摘自《周末》

ZHENGZHOU DAILY

编辑 李昆霞 电话 67655539 E-mail:zwbwh1616@sina.com

李连杰的“急刹车”

一次,在壹基金座谈会上,创办者李连杰向来宾动情地说起了他的幸福和快乐。他的眸子中闪烁着晶莹,仿佛陷入了遥远的回忆中。他深情地说道:

从小到大,大人们就告诉我,你要出名,必须上好学校,考第一,这样才能出名。于是,为了出名,为了那个叫“名”的东西,我拼命努力,习武练功,从不敢怠慢。不知不觉,我得到了许多的“名”。于是,我心中有了一种沾沾自喜的优越和轻狂。可是,另一方面,我也失去了许多,失去了童年时代应有的快乐和稚趣。我的内心比同龄的孩子多了一份沉重,一种忧愁,而这些别人却无法察觉到,以为我很幸福很快活。

到了16岁时,我又发现,光有名还不够,还应该有利。只有名利双收,才能得到更大的幸福和快乐。于是,我又向着“利”的道路,拼命地奔跑。就这样,到了1982年,我已经有10万块了。当时的10万块,绝对是个天文数字。但是,很快我又觉得不幸福不快乐了。因为我觉得这些钱还不够,还远远不够,我还需要更多的钱。又是几年过去了,到了1985年,我已经有了一百多万了。一百多万啊,我数着这些花花绿绿的钞票,常常偷偷地乐,夜里做梦都会笑醒。但是,我又想,如果再有几个一百万,甚至达到上千万,那

我就再也不会再有忧愁和烦恼了。不知不觉到了1992年,我在银行里的存款已经上亿了,这钱多得我已经数不过来了。可是我觉得还不够,因为在我前面,还有无数个比我钱多的人,我这些钱和他们比起来,根本算不了什么,我必须更加拼命努力,追赶他们,争取更大的名和利,这样,我才能得到更大的幸福和快乐。

有一天,一位已年届七旬的长者叫我和他一起跑步。一路上,长者对我不停地唠叨他的烦心事。他说,他一生积累了许多财富,可是现在一点也不觉得幸福和快乐。我问他,你有这么多钱,为什么还不幸福、不快乐呢?

老人说,他是将自己一生积累的财富留给老大呢,还是留给老二?留给老大,老二不高兴,可老二是个不务正业的人,留给老二,老大又不高兴,老二凭什么得到这些钱财?这件事,让他觉得很痛苦很烦恼。

长者的话让我很吃惊。到了他那么大的岁数,原来还一直痛苦烦恼着,他被自己积累的那些财富紧紧地纠缠着,一直找不到幸福的出口。这件事,给了我很强的心灵震撼。于是,从那天开始,我来了个“急刹车”。很长一段时间,自己什么事也不做,我在努力地思考,自己应该追求一种什么样的幸福和快乐。

我忽然发现,我有点错了。因为我所得到的这些名和利,好像都是身外的东西,也就是说,我的幸福和快乐都是暂时的,我究竟是在追求幸福本身呢,还是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来回折腾?

我渐渐地发现,必须将不幸福和不快乐的事去掉,剩下的才是幸福和快乐。我真正的梦想就是在帮助他人时,也能帮助自己,你帮助别人,使别人幸福快乐,自己也幸福快乐。而这就是“助人为乐”。就是带着这样一个梦想,我一直在思考、在探索。

有人说,你那么有钱,你幸福快乐;我们没有钱,当然不幸福不快乐,我们之间是不平等的。我说,我们永远都是平等的,我们都会死,都会死。所以,我不会为武术奋斗一生,尽管武术在我生命中很重要;我也不会为电影奋斗一生,尽管电影是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公益事业很重要,但我也不会为之奋斗一生。我只想把自己的幸福和快乐不断地传递给生命中的每一个人,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幸福快乐,因为那是我生命的意义。

“将自己的幸福和快乐,不断地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得到幸福和快乐”,这就是李连杰在他34岁“急刹车”后的一种思考和顿悟。他在不断地传递着自己的幸福、自己的快乐,用自己的幸福和快乐,感染着更多的人,带动着更多的人。看到更多的人有了幸福和快乐,他觉得生活更加有了盼头、有了念头、有了想头。

摘自《文苑》

每张纸上除有一两只草虫外,全是空白。那时我才明白,是父亲趁早年眼色好画下来搁在那里,待年老眼花不够用时,在草虫纸上补画用。”

白石老人的干女儿、评剧大师新风霞的一段回忆,也印证了齐良末的说法:老人又从柜子里取出一卷画,大幅的白纸,每张上面却只画一两只小小的草虫,蜻蜓、蝴蝶、蜜蜂、知了……他让我挑选,我就拿了最上面的一张知了,老人把纸铺在画案上,提笔画了一幅秋天的枫树,这只秋蝉就趴在枫树枝上,配上红色的枫叶,真是一幅好画。老人在画上题了两行字,是:“祖光风霞儿女同室壬辰七月五日拜见九十二岁老亲题记”。

白石老人不仅将草虫画到了极致,而且将草虫画提到很高的境界。他认为,草虫是一幅画的“眼睛”,是神来之笔。

摘自《特别关注》

齐白石留白画草虫

贺祥

齐白石老人画的蜻蜓较照相更为细微,蜻蜓的翅膀画得很透明,有一触即掉的质感,翅膀上脉络历历可辨,跟拓印的实物一样。蜻蜓的身躯、眼睛乃至足都非常清晰,真是不可思议。

白石老人的儿子齐良末说:“我父亲对草虫情有独钟。他曾对我说:‘别小看这雕虫小技,它能名扬天下,求画者皆以草虫苦我。’父亲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当时他的工笔草虫已征服了北京画坛,当然也是他‘红花墨叶’改革成就的一部分。父亲年轻时多以工笔草虫与写意补景。我见过父亲做成的草虫标本,他对我说,

年轻时,他经常到野外观察草虫。父亲画的草虫,结构精准,粗中有细,静中有动,极为传神。父亲在工笔画技法上的许多创新与运用,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

画工笔草虫很费眼力。然而,白石老人八九十岁以后的画上,却也常见工笔草虫,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齐良末解开了这个谜底:“父亲70岁后,多用写意画草虫。为防止年老眼花不能画了,他在60岁左右就专画了一批工笔草虫,以待后来补景用。我父亲是1957年去世的。事后,我们整理爸爸的遗物时,发现他箱子里还有两大卷宣纸,展开一看,

名流故事

再往前迈一步

雪冷肌香

她站在三米跳台上,恐慌写满了脸。尽管老师和同学不断地鼓励她,她还是害怕得泪水流了出来。她的腿抖得非常厉害,她看着跳台,后退了一小步,又前进了一大步。她的泪从闭着的眼里流出,还挂在腮边,但是,身体却已经飞下跳台。

从水里出来,小伙伴问她是怎样战胜胆怯的。这时,她还没有从恐惧中完全挣脱出来。她颤抖地说:“爸爸说过,遇到困难的时候闭上眼睛也要往前迈一步。”

闭着眼睛,再往前迈一步。这成为了她的一个信念。正因为此,她在学业上进步很快,尤其是在科学方面显露出不同凡响的能力与才华,她两次参加华约国家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她的数学老师曾这样评价:“我从来没有在数学班上见过她这样的女孩,她真的很少见——逻辑性强,分析能力强,注意力非常集中。”32岁时,她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

与此同时,她开始了另外出色的一面,那就是对政治的极端关心

生存逼着我成功

闻丘露薇

我还记得自己刚刚到深圳的日子。那段日子,让我真的明白什么叫做生存。

因为母亲的关系,大学毕业之后,我到深圳去了,放弃了在外资公司的工作,在母亲的公司帮忙。所谓的公司,其实就是那种皮包公司。我和母亲还有她的几个带着发财梦来到深圳的亲戚,也算是她公司的员工一起,在深圳的一栋民房里,每天忙忙碌碌,和形形色色的人碰面。

我还记得那个夏天,我提着一个箱子,来到母亲既是办公室,也是住宅的地方。母亲的第一句话是,你怎么穿得这样不好看。那一天,我穿的是一件简单的白衬衫,和一条长长的花裙子。母亲总是嫌我长得不好看,因为那样在她的眼中,我很难找到一个有钱的男朋友。看上去还非常年轻的母亲对我说,在外人的面前,不要说我是她的女儿。

当时的我,真心诚意地想,这个从来没有和我生活在一起的母亲,她曾经经历过多么艰难的日子,我应该帮她。于是,我答应了。

接下来的日子慢慢让我开始明白生活的艰难。我的母亲经常会突然消失一段时间,于是房东就会找我来要房租。她的这些亲戚每天都要开饭。曾经有一天,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块钱,看着他们,看着这个地方,我真的想哭。因为我不知

道,这两块钱用完之后,明天如何生活下去。

母亲消失的时候,我必须自己赚钱支撑这个家,同时也是支撑我自己。靠着同学的关系,我接到了一单礼品生意。我还记得我和我的同班同学一起,跑到别人的厂里和别人谈判。不过他们很快看穿了我的底价到底是多少,这个合同签订有点灰溜溜。不过好歹有点钱赚,心里面已经算是很满足。

还有一次,我母亲不知道从哪里拖来一百箱饮料,从东北运到了深圳。而她自己却不知去向。我手忙脚乱地找了一个仓库把这些饮料存放起来,但是开始为仓储费发愁。

面对这一大堆连我都没有听说过名字的饮料,我和我的同学一起,推着自行车,开始一家店一家店地推销。

就这样,在炎热的天气里,有一天下午还下着雨,我们的自行车倒在地上,一箱子的饮料从后座上面摔了下来。那个时候,一刹那我感到一种绝望,觉得自己不可能做任何事情。不过,这种软弱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我们扶着自行车,继续一家一家推销着我们的饮料。

最后,我记得,终于有一个好心人帮我们感动,于是我们又赚了一点钱,可以解决一大帮人一个月的生计问题。

为了生活,开头的几个月,我什

与关注,以及由此所延伸出来的属于她的政治辉煌。

她就是安格拉·默克尔——德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总理,最年轻的总理。当有记者问她,为何能坚持到最后,并取得胜利时,默克尔笑了,她说,我要好好地感谢我的父亲,因为他在我面对困难的时候都会重复这样一句话:“当你在烦恼事情没有什么进展时,请不要停下你也许发抖的双脚,请你再往前迈一步,只要一步。”

再往前迈一步,很多情况下可以让我们走出困境,感觉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成功。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要时刻告诫自己,要勇敢地再往前迈一步。

摘自《桂林晚报》

么工作都做过。酒店服务员,仓库管理员,还有国有企业的每天闲着没有事情做的老总秘书。换工作的原因,最主要还是工资问题,因为要租房,要应付日常的花销,因此那个时候,选择工作的首要标准是工资不是高。直到后来,在朋友的推荐下,我进入了一家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从此我的生活重新走上了轨道。

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要感谢在深圳的这段日子。因为在这段日子里,我看到了那么多在生活底层挣扎的人们如何生活,我也接触到了形形色色三教九流的人,他们做着不同的事情。但是他们最初的出发点都是一样,为了生存。

在这段日子里面,我也体验到了,很多时候为了生存,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和韧劲来面对这个社会的人和事。

我的那位同学,我们在深圳一起待了一个月之后,他回到了自己的老家湖南的一个偏远县城,他说过,他的理想是要进电视台工作,之后我听说,他在县城的电视台主持少儿节目。后来我们失去了联络。

八年之后,当我们在北京再见的时候,他已经是珠海电视台的一名编导,而我则成了凤凰卫视的一名记者。他告诉我他用五年的时间,从县城走进省电视台,然后又只身来到珠海,从一名编外人员成为电视台的正式员工的整个过程。他说,深圳的那段日子,教会他,如何在艰难的时候,勉励自己一定要走下去。

摘自《读者》